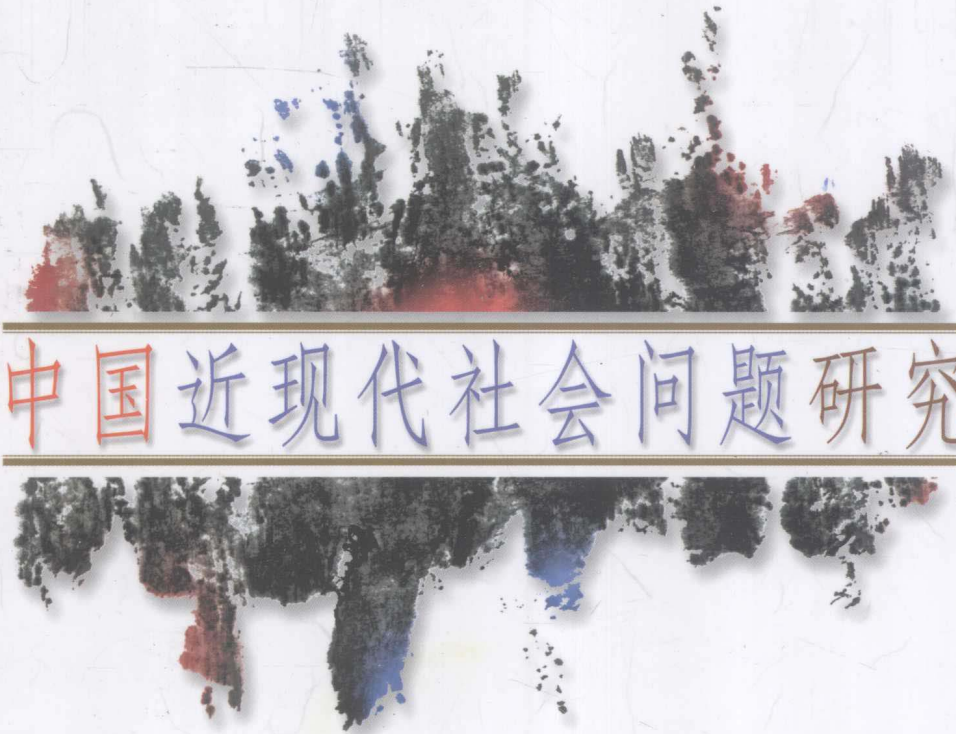




邵 雍 □ 编著



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D 693.9

D693.9

S336

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

邵 雍 编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邵雍编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650-0162-8

I. 中… II. 邵…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中国—近代 IV. 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4489 号

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

邵 雍 编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印 张	31.75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603 千字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162-8

定价: 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秘密社会与近代中国	(1)
上海小刀会起义前的闽广游民与本地豪强势力	(3)
太平天国时期的盐枭	(11)
从《点石斋画报》看晚清江南地区的盗匪问题	(19)
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与中国秘密会社	(28)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秘密会社反洋教斗争	(35)
论苏元春与会党游勇的关系	(43)
清末烟苗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考察	(49)
万国禁烟会前的上海禁烟斗争	(61)
晚清上海乞丐初探	(79)
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的人口拐卖	(88)
从《点石斋画报》看妇女与上海早期城市的发展	(96)
从清末民初上海婚俗的变革看上海妇女婚姻自主权意识的觉醒	(106)
近代化过程中弱势群体的慈善救助	
——以民初上海新普育堂为视角 (1912—1916)	(116)
针对问题群体的上海慈善教育	(125)
对晚清至民国时期禁彩现象的透视	(150)
中国共产党对秘密会社的认识	(159)
民国时期的土匪	(163)
匪帮内部窥探——以刘桂堂为中心	(178)
20 世纪 20 年代妇女节制会在上海的活动	(192)
《妇女杂志》关于离婚问题的讨论	(200)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匪首的婚姻家庭概观	(2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娼妓问题	(21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禁毒与贩毒	(223)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	(231)
民国上海童工问题研究	(244)
上海女工的工作环境与待遇	(255)
《妇女杂志》中的产业女工形象	(279)

1927—1937 年上海女性犯罪的原因	(282)
1927—1937 年上海地区的女性拐卖犯罪	(287)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对乞丐的救助	(293)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游民以及游民习勤所对他们的收容教育	(298)
1926—1937 年上海华界瘟疫的社会背景	(307)
1927—1937 年国统区的灾荒及赈灾事业	(314)
20 世纪 30 年代红卍字会的各地赈灾工作	(323)
1932 年旅沪同乡会的难民救助活动	(327)
1935 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	(333)
红军长征与秘密会社的关系	(343)
1935—1941 年陕北地区社会环境治理初探	(349)
日本侵略者利用秘密会社破坏抗战述略	(365)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舞女	(388)
社会控制视野下的民国一贯道	(397)
1946—1951 年国民党利用帮会土匪反共述略	(408)
解放初期的禁娼斗争	(418)
解放前后上海摊贩管理的比较研究	(432)
解放初期上海的游民改造	(443)
解放后向境外转移的会道门	(454)
新时期以来境内外会道门的动向	(463)
解放后青浦水上姻缘探究	(465)
当代皖北农民离村现象研究	(478)
痛击当代中国邪教	(489)
邪教是恐怖之源	(493)
当代中国的黑社会问题	(496)
禁止毒品任重道远	(498)
对当前社会问题治理的一点看法 ——以嫖娼卖淫为中心	(499)
后 记	(503)

秘密社会与近代中国

秘密会社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近代产生重大影响的秘密会社有帮会和会道门两大系统。

帮会又分青帮和红帮。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讲究义气，不同的是前者讲究父子辈分，后者强调兄弟之情。从时间上来看，青帮的源头可追溯到明代的罗教；红帮依次登场的是产生于清乾隆年间的天地会以及后来出现的变种三合会、三点会等。在进入20世纪之前秘密会社特别是洪帮进行过反清复明的斗争，但由于它的组织成员逐渐变为以不事生产、扰乱社会的游民为主，因而也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损失。

太平天国时期福建、上海两地小刀会先后起义。接着天地会在广东发动了洪兵大起义，在一段时间里占领了除省城广州以外的全部土地。后又移师广西，建立了“升平天国”等反清政权。

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中，哥老会等秘密组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发动和组织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均注意到了帮会这股潜在的社会力量，称他们是豪杰、好汉。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康有为企图利用广东广西和长江流域的帮会进行“勤王起义”，唐才常搞的自立军就是按帮会哥老会方式组织起来的。孙中山在1900年以及1907—1908年的多次武装起义中主要是利用帮会的力量，屡战屡败。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共进会也是以哥老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山堂香水一应俱全，在两湖、江西、四川拥有较大的势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地方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与当地帮会的力量强弱均有一定关系。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与帮会的联盟迅速瓦解了。推翻满清的共同目标达到后双方在政治理想、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方面几无任何共同语言，分道扬镳势在必然。李烈钧在江西大杀帮会成员的目的是要稳定局势，恢复秩序，站稳脚跟，与袁世凯相抗衡。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棋高一着，收买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青帮首领应桂馨刺杀了时任国民党党

魁、当选总理呼声最高的宋教仁。国民党虽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再次起用帮会势力，但始终未能胜券在握。

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一批全国性的会道门组织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支持下公开立案登记，取得了合法地位。某些在辛亥革命后一直野心不死的会道门头目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登基称帝的丑剧。与此同时帮会在农村逐渐土匪化，在城市逐渐流氓化。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时利用了上海黄张杜三大亨流氓帮会势力，勾结帝国主义，让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倒在血泊之中。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帮会势力恶性膨胀，与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中统、军统）以及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相互勾结、相互渗透，打成一片，造成了流氓政治化、政治流氓化这样的特殊社会现象。会道门因其封建迷信色彩过于浓厚，而且与国民党素无历史渊源，屡遭国民政府的查禁。

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期间成功地改造了一大批帮会武装，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毛泽东与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交往即是范例。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作怪，毛泽东的举动被指责为“土匪路线”。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井冈山一直被国民党控制在手中直到1949年解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秘密会社发生了大分化。一部分奋起抗日，另一部分则叛国投敌，一贯道道首张光壁充当了汪伪政府的外交专员。在抗日的洪流中共产党团结、争取、改造了一批红枪会、大刀会和青红帮。国民党对秘密会社的控制和影响有所削弱。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宣布“还政于民”，秘密会社特别是洪门帮会急于分享政治权力而纷纷组党，较重要的帮会政党有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洪门民治党等。国民党为了重新加强对秘密会社的控制和影响，通过军统于1946年一手炮制了全国性的秘密会社集合体——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在随后的“国大代表”、地方参议会等公职选举中，帮会势力利用暴力、金钱等不法手段干预选举，开创了“黑金政治”的先河。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有计划地策动秘密会社积极“应变”，对抗人民革命。1949年7月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后反思了其在大陆溃败的原因，批评了过去党中少数同志养虎遗患的不智，承认“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与买办流氓妥协……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提出“现在我们不能再妥协下去了，也不容再苟安下去了。”但事实上国民党为了挽救败局，继续在华东、中南、西南等地勾结反动的秘密会社，进行所谓的“总体战”与“敌后游击战”，直到在大陆彻底失败。

上海小刀会起义前的闽广游民 与本地豪强势力

1853年9月5日周立春在嘉定造反，7日刘丽川在上海县城起事。他们打出的旗号均为上海小刀会。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在这支造反的队伍中大多数是闽广籍人士，其主要首领除广东籍的刘丽川外，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均为福建人。在江南地方官府的缉拿小刀会次级领袖名单中，40人中有26人为闽、广籍，^①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多，“城内平民对三合会党徒都远而避之”，^②有外国人称，“上海人跟这次暴动完全无关，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③清朝官方也有奏报：“此次会匪倡逆，闽广之人从乱如归，非帮同拒敌，即设法接济”^④。

闽广移民成为上海小刀会起事的主体绝非偶然，是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的。众所周知，地处福建南部的漳浦县是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天地会的发源地，广东则是天地会最早传播的省份。小刀会也起源于福建，有的是天地会的变种，而三点会、三合会也是天地会的变名与分支，盛行于广东。有清一代，福建、广东人均耕地向为全国最少，粮食多不能自给，外出谋生的人很多，对福建南部的人来说，下海经商是其主要职业，他们善于开拓，争强好胜。早在乾隆时就有闽广商人在上海购置房地产，“邑小东门外，沿壕负郭，皆闽广人僦居”^⑤，《上洋竹枝词》也有“东门一带烟波阔，无数橈桅闽广船”的句子为证。^⑥鸦片战争前后，广东、福建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治安情况恶化。在濒海近洋的广东，三合会众“勾连凡五六省”，“剽掠乡曲”，抢劫商旅，“无所忌憚”^⑦。三点会在1839年左右也是“抢赎勒赎，杀人放火，无所不为”^⑧。“广州府属香山等处，每逢稻谷将熟之时，该会匪辄……

① 王尔敏：《晚清社会文化生态》，第421—42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6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8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 毛祥麟：《墨余录》卷十五。

⑥ 转引自《上海通史》第2卷“晚清社会”，第3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天地会》第6册，第518—5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⑧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32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勒令给伊钱文，较租金十分之一二，名曰打单。不遂所欲，即约会无数匪徒，将所种田禾尽行芟刈践踏，以泄其愤。土人苦之，谓打单急于国课。”^①林则徐曾经上奏报告广东弥盗之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良盗难分”。“他省之民，良自良而盗自盗。广东不然，平时耕作之民，遇有夤夜纠劫者，但以‘发财去’三字，随路招呼，鲜不欣然同往。故同一为盗之人，彼此每不相识，即人数亦无可稽。甚至田舍素封，衣冠巨族，亦皆乐于一试。若惠、潮地方竟有以盗起家，转因党羽太多，不能破案，人不敢指，官不得拿者；并有通族皆盗，通乡皆盗，一拿即恐滋事，不得不略审机宜，设法诱获者。”另外，广东“为盗者并非贫苦，竟以挟衅行强，被盗者不即呈官，辄先纠人报复，迨事过则彼此互控”^②。

在福建“水师和洋盗，是一是二，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是所恒有。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水师提督窦建德，即洋盗投诚者”^③。

由于福建、浙江距离上海较近，鸦片战争后因失业到上海来谋生的人也为数不少。闽浙总督刘的珂曾指出：“查福建之漳州、泉州、兴化、福州与浙江之宁波、台州、温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来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④

闽广籍人进入上海后，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谋生。《小刀会纪略》称，上海开埠后不久“洋商日盛，租地日广，所雇通事工人，大都闽、广流民，依势横行。当事无敢严诘。”^⑤广东人在上海开埠后任外商翻译的不少。王韬说过：沪地“百货闾集，中外贸易，惟凭同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⑥广东人刘丽川当过通译，“尝为夷商通事”^⑦，他原本是糖业捐客。李咸池曾经做过糖业捐客，也做过棉花生意。福建人陈阿林为“上海仁记洋行看马”^⑧。早在1848年11月道光帝就发表上谕认定，“自五口通商以来……华夷杂处，良莠不齐，吴淞为腹地门户，客货夷船向称繁盛，开设行店及往来说合贸易之人，若不严行查察，必有游匪巨蠹。溷迹为奸”^⑨。然而上谕归上谕，上海地方官员仍然拿不出一套好的办法来管理这些涉外人员。

① 《天地会》第6册，第5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58—859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页。

④ 《史料旬刊》第36期，第319页。

⑤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983页。

⑥ 《瀛寰杂志》，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⑦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793页。

⑧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753—754页。

⑨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七册，第88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咸丰帝画像

在上海社会身份较低的福建人“大部分在运送食糖的民船或其他海船上服役。”^①另外闽粤游民“霸占垄断”了在上海黄浦江上摆渡的马嘴舢板小船，而船头即是福建同安人林阿福。^②林阿福原为上海城小南门城堞扬旗的地棍。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摆渡船连同向泊黄浦的闽、广蛋船、乌船主人大多“弃舟从逆”^③。

“迨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须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粤海关裁私归公”，导致先前以此谋生的广东潮州等府民众“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自上海以至苏州，动辄聚至盈千累百”^④。这些流落江南的闽、广奸民，“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嗜利好争，动辄纠众，械斗拒捕，愍不畏死”^⑤。1845年6月道光帝发出上谕，“江苏上海县至苏州府一带，有匪徒贩卖鸦片，连檣载运，络绎不绝，各船带有火枪火炮，兵役畏其人多，不敢查拿”，要求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确切查明，“实力查拿，严行究办”^⑥。

① 《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8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8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第5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⑤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1022页。

⑥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七册，第57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护送、贩卖鸦片是闽广游民主要的经济收入之一。“闽人陈阿林、林阿福、陈阿六、李仙云等，粤人则李少卿（即李绍熙）、李爽轩，平素皆卖烟聚赌，刁悍不法，广结党羽，无籍游民多附之。”^①即使是后来成为上海小刀会头号首领的刘丽川也是一个身体瘦弱、容貌苍白的吸鸦片烟者，而且还在上海小东门“开烟店为生”^②。鸦片生意不仅使闽广游民与提供鸦片资源的英国不法商人建立了联系。据英国侨民斯嘉兹著文介绍，在上海小刀会中“好些人做过外侨的仆役，也有几人曾在租界招商，但谁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③。鸦片生意还使闽籍与广籍的游民帮会经常接触并且与上海本地人也发生了关系。1853年7月时任广东嘉应州公所董事的李绍熙自上海押运一批鸦片烟出去苏州贩卖，途经青浦千秋桥时被人假冒周立春之名劫夺一空，李绍熙径直找周立春交涉，周立春“押令陪还”。李绍熙见周立春很有实力又讲交情，便介绍周立春结识刘丽川，加入天地会。至此周立春“遂与闽、广、宁波人认识交好，结盟拜会”^④。

刘丽川是广东天地会的首领之一，于1845年11月19日在香港从劳德泽先生手中接过有权发展会员的旗斗，暗招军士。由于他“作贸易于上海，富于财，素交纳，有豪侠名，贼多悦服之，推以为首”^⑤。刘丽川的贡献在于他发展的会员、所招的军士没有仅局限于广东籍人员。为了在上海打开局面，还在上海郊区的青浦人士周立春也成了他结交发展的对象。

周立春原是青浦白鹤江里正，兼充粮长。1852年7月周立春联络二十余图的民众、武装反抗青浦知县余龙光追征前已奉豁免钱粮的乱命。在当地民众中有较大的号召力。同年10月他又率众冲进新泾巡检衙署，“滋闹殴抢”^⑥，并到武生任琳、监生任文蔚家“放火抄抢”，夺得钱财衣物，由他“收存公用”^⑦。周立春参加天地会之后，于1853年8月联络嘉定的罗汉党发动了武装起义，攻入嘉定县城，救出罗汉党首领徐耀后，马上撤离。

罗汉党是上海本地为数不多的秘密会党之一。它以嘉定南翔镇为根据地，“械斗杀人，不一而足。”^⑧徐耀本人就是因偷盗大德寺而被官拒捕的。^⑨当初徐耀等劫了贯之的财物，贯之控于县衙，知县冯瀚不问，直到上海道吴健彰令冯瀚查办，冯才派役捉拿。如果不是贯之与吴健彰有个人交往，此案也可

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985页。

②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165页。

③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552页。

④ 《福建·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第330页。

⑤ 《雪鸿山馆记年》第17页。

⑥ 《福建·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第329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军机处录副奏折两江总督怡良等奏折（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⑧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1053页。

⑨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1052—1053页。

能不了了之。罗汉党在嘉定、青浦两县邻近的地区彭安庙、陈典、真如一带农民中拥有五六百名成员。

另外在真如芥四图三千里村，有吴胜为首的团伙“三千帮”。吴胜，小名阿熊，身材魁梧，武艺高强，好打抱不平，雄霸一方。洪复章、王德乾两部《真如里志》及1928年洪兰祥编《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表册》中，均记有其人其事：“打降之风，自昔而然。道光之季，三千里吴胜者，称雄于乡，力霸南翔、江桥、真如诸镇。所到之处，恶少争附，呼叱立致千人，后卒为仇家所害”。所谓打降之说，初见于明崇祯殷聘尹《外岗志》，系指“拳勇少年，三五成群，割刈田禾，抢夺妇女，或借尸讹诈，或逞凶报仇”。之后，此风在嘉定、宝山地区泛滥，各级旧志时有记载。如《彭浦里志》称：“地方棍徒，什佰为群，逞其拳勇，睚眦必报，致酿重案。凡撇青打降，逼醮开赌，诸不法事，皆出若辈，里中衔之，号曰獠皮。”据真如地区文献及采访所得看来，吴胜交游广泛，伙党甚多，出入真如、南翔、江桥、大场地区。因此，以南翔为主要活动舞台的罗汉党领袖徐耀、胜传，或产生于彭浦的庙帮领袖潘启亮，甚至青浦周立春等人，与吴胜都应早就相识并有结交，但吴胜则虚与委蛇，为小刀会提供了一些方便，自己并未加入。^①

上海土著秘密会党还有庙帮和塘桥帮。庙帮，又叫彭王庙党，以其点在宝山大场镇属彭浦的彭王庙而得名。该会党的主要成员是大场镇附近的农民。庙帮的首领潘启亮是江苏南京人，其父充狱卒，因而得“小禁子”的绰号，又被人叫做潘小镜子。

塘桥帮以其活动中心浦东塘桥而得名，又称浦东帮，主要于塘桥、三林塘一带活动。该帮以浦东三林庄人、武生朱月峰为首。该帮约在1852年至1853年间形成。后来塘桥帮和庙帮合并，号称百龙党。

百龙党在南汇乡村发展较快，周浦塘南的排马庙是该党经常聚会之地，有时聚众饮酒的多达100余席，故史书上有“百龙党人南邑殆半”^②的说法。

庙帮、塘桥帮、百龙党“初不过聚党成群，索诈铺户，见民不敢讼，官不为捕，遂明目张胆，无所忌惮，甚至白日持刀，抢劫行旅，浦滩上落货物，任意掳取。商船船主及耆舵等人上岸，亦被掳去，逼令持银以赎。”^③

上海官方对闽、广游民问题有一定的认识。1850年7月28日上海县知县平翰出示，要求闽、广异籍民人“确有常业者，均须向地保登记，领取户口单……不准随意结伙滋扰”，“诈骗钱财”。^④可能是游民们置若罔闻，1851年

① 详见许洪新：《从几种乡里旧志简谈罗汉党若干史料问题》（未刊稿）。

②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986页。

③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983页。

④ 《近代上海大事记》第40页。

3月上海官方在洋泾浜南按搞过一次围捕闽、广游民的活动。^①如果说地方当局对闽、广游民还有一点措施办法的话,那么对于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各同乡会馆(主要是闽、广籍的)则束手无策,根本无法驾驭。

在各种帮会组合成上海小刀会的过程中,上海各同乡会馆绅士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前述广东嘉应州董事李绍熙之外,福建兴化会馆馆主李仙云也不容忽视。李仙云此人在同乡中很有权势,“出入乘舆,拥众自卫,当事者畏其甚。各行商号每有贸物到埠,必先纳银与李处,上岸时始免掳抢”^②。也就是说商家如果不交保护费,则必遭李仙云指使的歹徒的劫掠。

1843年上海开埠时城市人口约20万,到1853年小刀会起事前已经超过50万。根据统计,当时在上海的福建移民有6万多,广东移民8万。^③南市咸瓜街即是福建泉漳商人的落脚地点和聚居地。

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并定都后不久,清政府方面却在南京附近建立起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清军将领张国梁“率皆广潮勇丁,营于金陵京口间,屡克敌营,掳掠极富。有还乡者,乡人艳之,鬻产卖犖,以作路费,贸贸然来者踵相接也。忽大帅以潮人悍且贪,檄不用,乃相率散为盗,以上海为逋逃藪。日众一日,缉不胜缉;乃议遣散,遣而不散”^④。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上海清朝官方一片惊慌。1853年5月福建小刀会在海澄起义,很快攻占了厦门等地。消息传到上海后,闽省同乡“益思乱。至夏秋之交,道路借借,言小刀会将起事矣”^⑤。然而上海与厦门等地不同,前者的秘密会党是多元的,后者的秘密会党是唯一的。因此要在上海发动反清起义,首先必须协调好各会党组织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要协调好以福建籍游民为主的小刀会与广东省游民为主的天地会之间的关系。

上海闽籍小刀会的首领是福建龙溪县人、闽馆董事李咸池。^⑥李咸池早年离乡背井,来到上海充当糖业掮客,又经营棉花行贸易。他和李仙云、林阿福等人组建了小刀会,积极在闽籍航运水手、船户中发展会员;李咸池和林阿福又是与刘丽川谈判协商、合组包括大部分秘密会党在内的新的上海小刀会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在这一新的统一的秘密会社中,李咸池名列第二,是小刀会中仅次于刘丽川的重要领导人。1853年8月上海道专门出告示禁止小刀会活动,称“本道近日风闻有不法匪徒李姓者,为首倡议结会树党,勾结本地土棍及闽、广、宁波各处无赖匪徒,千百为群,刊刻木戳佩带身边,暗

① 《近代上海大事记》第43页。

②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983页。

③ 《上海通史》“晚清社会”第62页;《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759页;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8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946页。

⑤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36页。

⑥ 《吴熙档案选编》第4辑,第36页。

作记认，希图凌弱暴寡，鱼肉善良，抢夺拒捕。彼得此应，为害地方。”^① 这里所指的“李姓”即李咸池。8月中旬署理上海知县袁祖德在县城北门外将李咸池等人抓获。但由于小刀会众不断施加的压力和威胁，再加上李仙云的积极援救，李咸池等人不但安然出狱，还拿了一笔损失费，以补偿他们被拘押的损失。以后，李咸池更是胆大妄为。^② 小刀会起事前，已经有所觉察的吴建彰在给法国领事的信中说：“本道风闻咸瓜街一带，各绸布店内红、黄等色之料，均为广东匪徒买尽，希图乘机滋扰。”^③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闽、粤两大帮派的整合或磨合程度。

合并重组后的小刀会主要有七个部分，《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称：“小刀会有七党，闽广为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④ 《遐尔贯珍》的介绍更为具体，说“会中复判七党，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上著则上海也。”^⑤ 实际上七党是当时上海存在的以地域划分的会所在小刀会中的反映，其中建指福建的泉漳，兴化指福建的兴安（因宋末当地曾改称兴安州），广指广安会馆，潮指潮州公所，嘉应有嘉公所，宁波有宁波公所，上海有上邑附城的一批绅士。

1853年7月间小刀会势力大发展，“城外铺户屡有抢夺，富家皆募乡勇以自卫……诸董事议设条款，欲以小刀会人作团练，联名告以兵备。”兴安泉漳会馆、嘉应州公所等七个会馆公所的代表向上海官方提出了招游民为乡勇的建议。他们宣称“际此逆匪扰攘，而不法匪徒往往藉端生事。上洋为五都之市，商贾辐辏，货物囤积，若不思所以保卫之方，则抢夺频仍，商本血本攸关，谁敢复行贸易！”他们提出应当“联设更练，无事则支更，有事则堵御。……从此匪徒敛迹，货物可无抢夺之虑，各至如归，银钱岂有劫掠之患！”^⑥ 这些人关心的是他们在上海的经济利益，明为防范太平军，实则乘机把他们控制的游民力量进一步控制起来，增强控制地方事务的能力。与此同时七八月间“上游招勇，闽广无赖之挑剩遣回者，来而失所，作队游魂，依城凭社，愈积愈多，既无口食，又不押回，终日抢诈，不计巨细，而养痍之势已成”^⑦。虽说上海地方当局接受上述建议是无可奈何之举，但其中乡情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苏松太道吴健彰籍隶广东，饶于财，以纳粟得官，粤人恃乡谊，多不法，终姑息不坐，且广招潮勇以自卫，悍者日给洋数十元，不知皆贼党也”^⑧。

① 《近代史资料》总第93号，第36页。

②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53页。

③ 《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第35页。

④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36页。

⑤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1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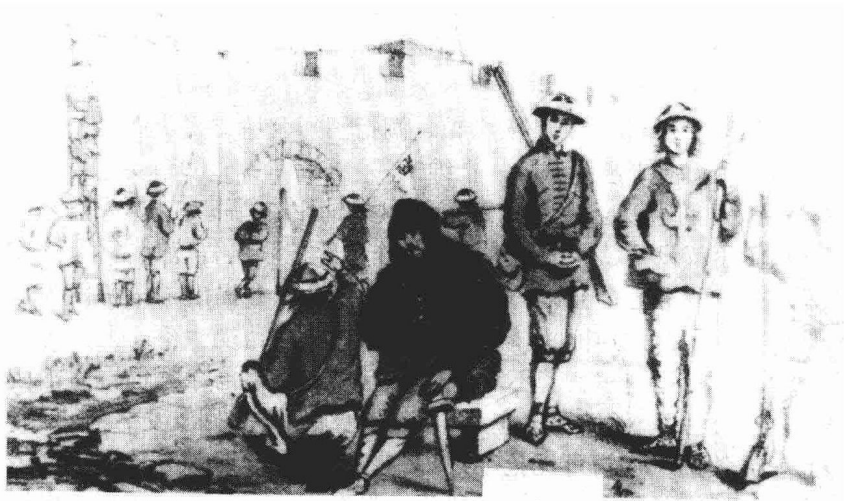
⑥ 《近代史资料》总93号，第37页。

⑦ 《觉梦录》第3—4页，上海通社1935年校刊本。

⑧ 《上海小刀会起义汇编》第8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然而游民们被招募为勇后，依然陋习不改，“日集茶坊酒肆，聚赌吸烟”。“烟赌不足则群饮奸淫，群饮奸淫又不足，则变而为花鼓场串客唱戏而已也。盈千累万，歃血拜盟，各立门户”^①，其中以小金子潘起亮的表现最为出格。《雪鸿馆纪年》记载“小金子来应募，用以为勇，嗣因桀骜不驯，时出滋事，斥革之。小金子益无忌，日与其党横行城市间为民害”。潘起亮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原本拟以站立笼的形式处死，后为绅士徐芝珊代请释出。

1853年9月5日周立春、徐耀率众起义，进占嘉定县城，并公开打出了洪门“义兴公司”的旗号。两天之后，刘丽川领导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县城，潘起亮手刃袁祖德，苏松太道吴健彰被活捉。



上海小刀会战士

总之，没有鸦片战争前后粤闽沪下层社会的孕育演变，就不可能有1853年秋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从娘胎里就带来了它的绿林胎记：既有反抗官府的暴力举动，也存在着勾结洋人贩卖烟土、收取保护费等劣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特别是在他们后来没有与太平天国建立实质性联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539页。

太平天国时期的盐梟^①

一

“盐梟”是清政府对私盐贩的一种蔑称。盐梟走私是一种有组织、有武装的贩私行为。虽然在史籍中往往用“盐梟”、“梟徒”等字眼指所有的私盐贩子，但是，清人往往还是会用是否有组织与武装来划分“梟”和“非梟”，对于“梟”和“非梟”犯案的惩处律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组织”和“武装”是区分盐梟与否的重要标志。盐梟走私往往千百成群，各执枪炮，敢于同官兵分庭抗爭，捣毁盐卡，抢劫官盐，有的还卷入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是官府深感头痛的势力。

清代食盐走私活动一直十分活跃。食盐走私之所以盛行不衰，是因为私盐具有一系列官盐所不可能具备的有利条件。所谓私盐，就是由商贩偷运，没有缴纳盐税的盐，因此私盐没有窝价、课税负担，也没有压上面的官僚机构；不受引地的限制，运输过程中也没有那些繁琐的手续，且流通费用少。因此，“梟私价贱，色净，秤足。凡商之百计病民者，皆为梟作利市。”^② 盐梟走私的食盐来源颇广，最常见的是从各种可以合法或非法获得食盐的人手中购买，或者直接购自场灶，或购自盐商，或购自船户，或偷扒抢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清代全国有十一个盐场，各个盐场都有规定的销售区域。在长江下游地区，盐梟走私的主要是两淮和两浙盐场的海盐。海盐主要是以滩晒为主，成本少而利润丰厚，“以致奸壮强徒，无不借口贫食，公然贩私，成群结党，目无法纪”^③。

二

“盐梟”成群结党，成分颇为复杂，无业游民是其中重要的成分之一。乾

① 本小节主要参考了姚张英《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盐梟》（未刊稿）。

②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五，《小倦游阁杂说二》。

③ 包世臣：《安吴四种》，《小倦游阁杂说》卷四。

隆五十一年，江南提督师懿德就曾说过“江北江南私盐充斥，梟徒聚众贩私……此辈系山东河南无业游食之徒”^①。李熙也先后奏称：“河北、山东、淮北等处流棍在扬州兴贩私盐，数百成群”^②，“淮扬一带地方，有山东、河南流棍，聚集甚多，兴贩私盐”^③。

咸丰初年，清代漕运制度废弛。由于鸦片战争以后，黄河连续三年决口，运河因洪泽湖泄水过多和借黄水济运，泥沙淤垫，河道淤阻更加严重。早在道光年间，清政府就试图改革漕运制度，试办海运，但进展一直非常缓慢。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以南京为首都，清政府遂将江浙地区的漕粮全部改为海运。海运改革使江浙地区依赖河运谋生的大批水手、纤夫以及搬运工人和集镇商贩等数十百万人，从此陷入失业困境。这些“游手无赖之徒”也就成了太平天国时期盐梟构成中的重要成分之一。“漕河全盛时，粮船之水手，河岸之纤夫，集镇之穷黎，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无生计，势不得不流而为贼。”^④

数以万计的无业游民，或投奔太平军，或加入清军阵营，或是以“安清道友”为名，聚集在两淮盐场，以贩盐、抢劫为业。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扼长江之险为固，戒备严密，行销居天下第一的淮盐，特别是淮南，因为运道梗阻，盐运不通，淮盐片引难行，这给在盐斤产地四周窥伺的盐梟以可乘之机。“查淮北每年只七八九三个月于盐闸开放之时发运一次，历涉五拨十杠，偷爬固不待言。淮南终年发运，仍通泰百十里场河中多高仰，夏秋稍旱，即难转运，船行在在藉迟，仪征运盐之河为江潮挟沙所壅，几成平陆，藉洲捆运，旷野难稽，以致仪扬梟徒收买场屯各船及洲地抛撒之盐转运出江，四处充斥。”^⑤“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⑥它是以失业漕运水手等为主干，融合活动在苏北一带的贩私集团“青皮”而组成的。青皮是在嘉道年间出现的具有严密组织的盐梟集团。这些盐梟集团活动于两淮盐场及其销售口岸，“资本多达数十万，大伙以数千计，小者二三百为群，炮位、枪矛、刀戟、鞭锤之器毕具，所过关隘辄鸣钲施枪，衔尾飞渡。凡安徽之颍、亳、庐、凤，江苏之徐、邳，河南之南、光，山东之曹州，湖北之襄阳，江西之南、赣，红鬃、教匪、捻匪、会匪以

① 师懿德：《奏陈获江北盐梟始末折》，《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三辑，第866—870页。

② 李熙：《请督地方官合力查拿私盐折》，《李熙奏折》第47页，中华书局版。

③ 李熙：《请督地方官合力查拿私盐折》，《李熙奏折》第129页，中华书局版。

④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

⑤ 《硃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道光元年二月五日。

⑥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一。